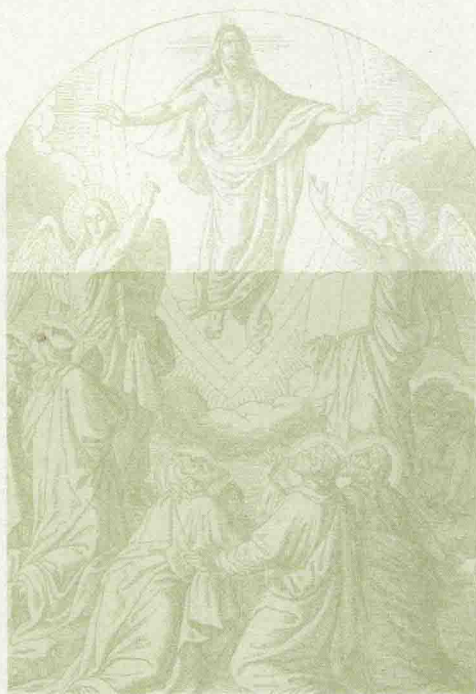


基督教经典译丛



Justin Martyr

Apology

护教篇

[古罗马] 查士丁 著

石敏敏 译

基督教经典译丛



何光沪 主编

副主编 章雪富 孙毅 游冠辉

Apology

护教篇

[古罗马] 查士丁 著

石敏敏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护教篇 / (古罗马) 查士丁著; 石敏敏译.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4.6

(基督教经典译丛)

ISBN 978-7-108-04939-1

I. ①护… II. ①查… ②石 III. 基督教—护教学 IV. ①B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2805 号

丛书策划 橡树文字工作室

特约编辑 刘 屹

责任编辑 张艳华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6.75

字 数 223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基督教经典译丛

总 序

何光沪

在当今的全球时代，“文明的冲突”会造成文明的毁灭，因为由之引起的无限战争，意味着人类、动物、植物和整个地球的浩劫。而“文明的交流”则带来文明的更新，因为由之导向的文明和谐，意味着各文明自身的新陈代谢、各文明之间的取长补短、全世界文明的和平共处以及全人类文化的繁荣新生。

“文明的交流”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对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经典之翻译。就中西两大文明而言，从17世纪初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首的传教士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为西文，到19世纪末宗教学创始人、英籍德裔学术大师缪勒（F. M. Müller）编辑出版五十卷《东方圣书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经典在内的中华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各国；从徐光启到严复等中国学者、从林乐知（Y. J. Allen）到傅兰雅（John Fryer）等西方学者开始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译为中文，直到20世纪末叶，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其他有历史眼光的中国出版社组织翻译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学和其他学科著作，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书籍也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些翻译出版活动，不但促进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双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的历程，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表现为洋务运动之向往“船坚炮利”，追求“富国强兵”，最多只求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

物质文明，结果是以优势的海军败于日本，以军事的失败表现出制度的失败。第二阶段的主导思想是“民主加科学”，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尊崇“德赛二先生”，中国社会在几乎一个世纪中不断从革命走向革命之后，到现在仍然需要进行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体说来，这两大阶段显示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十分肤浅到较为深入，有了第一次深化，从物质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

正如观察一支球队，不能光看其体力、技术，还要研究其组织、战略，更要探究其精神、品格。同样地，观察西方文明，不能光看其工业、技术，还要研究其社会、政治，更要探究其精神、灵性。因为任何文明都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不可分割的层面，舍其一则不能得其究竟。正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到了20世纪末叶，中国终于有了一些有历史眼光的学者、译者和出版者，开始翻译出版西方文明精神层面的核心——基督教方面的著作，从而开启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较为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第二次深化，从制度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

与此相关，第一阶段的翻译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为主，第二阶段的翻译是以社会科学和人文书籍为主，而第三阶段的翻译，虽然开始不久，但已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核心，有了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著作。

实际上，基督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止于西方文明。无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科学史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证明，基督教两千年来，从东方走向西方再走向南方，已经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从上古时代沿袭下来的对生命的价值、两性和妇女、博爱和慈善、保健和教育、劳动和经济、科学和学术、自由和正义、法律和政治、文学和艺术等等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观念，从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这个诞生于亚洲或“东方”，传入了欧洲或“西方”，再传入亚、非、拉美或“南方”的世界第一大宗教，现在因为信众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南方宗教”。但是，它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一“方”——由于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

家没有其存在，所以它已经不仅仅在宗教意义上，而且是在现实意义上展现了它“普世宗教”的本质。

因此，对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其意义早已不止于“西学”研究或对西方文明研究的需要，而早已在于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了解的需要了。

这里所谓“基督教经典”，同结集为“大藏经”的佛教经典和结集为“道藏”的道教经典相类似，是指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而不是指基督徒视为唯一神圣的上帝启示“圣经”。但是，由于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佛藏道藏那样结集为一套“大丛书”，所以，在此所谓“经典译丛”，最多只能奢望成为比佛藏道藏的部头小很多很多的一套丛书。

然而，说它的重要性不会“小很多很多”，却并非奢望。远的不说，只看看我们的近邻，被称为“翻译大国”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曾经拜中国文化为师的国家，由于体现为“即时而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的谦虚好学精神，一先一后地在文化上加强新陈代谢、大力吐故纳新，从而迈进了亚洲甚至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行列。众所周知，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韩国在其人口中基督徒比例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反而比我国更多更好地保存了东方传统或儒家文化的精粹，而且不是仅仅保存在书本里，而是保存在生活中。这一事实，加上海内外华人基督徒保留优秀传统道德的大量事实，都表明基督教与儒家的优秀传统可以相辅相成，这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基督教在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宫廷卫队到京城西郊欢迎传教士阿罗本主教，接到皇帝的书房让其翻译圣经，又接到皇宫内室听其传讲教义，“深知正真，特令传授”。三年之后（公元638年），太宗又发布诏书说：“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换言之，唐太宗经过研究，肯定基督教对社会具有有益的作用，对人生具有积极的意义，遂下

令让其在全国传播（他甚至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建造教堂，设立神职，颁赐肖像给教堂以示支持）。这无疑显示出这位大政治家超常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一千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一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贡献极大的翻译家严复，也显示了同样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他在主张发展科学教育、清除“宗教流毒”的同时，指出宗教随社会进步程度而有高低之别，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民众教化大有好处：“教者，随群演之浅深为高下，而常有以扶民性之偏。今假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而补苴之，殆无疑义。且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孟德斯鸠《法意》第十九章十八节译者按语。）另外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胡适之和陈独秀，都不是基督徒，而且也批判宗教，但他们又都同时认为，耶稣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改革对中国社会有益，宜于在中国推广（胡适：《基督教与中国》，陈独秀：《致〈新青年〉读者》）。

当然，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译丛，首先是想对我国的“西学”研究、人文学术和宗教学术研究提供资料。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有所贡献；还希望通过对西方文明精神认识的深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更希望本着中国传统中谦虚好学、从善如流、生生不已的精神，通过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中基督教精神动力的了解，对于当今道德滑坡严重、精神文化堪忧的现状有所补益。

尽管近年来翻译界出版界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这方面艰辛努力，完成了一些极有意义的工作，泽及后人，令人钦佩。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千年古国和文化大国来说，已经完成的工作与这么巨大的历史性需要相比，真好比杯水车薪，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即使以最严格的“经典”标准缩小译介规模，这么一个文化大国，竟然连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举世皆知的千年巨著《神学大全》和加尔文（John

Calvin) 影响历史的世界经典《基督教要义》，都尚未翻译出版，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汗颜的。总之，在这方面，国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本译丛的翻译出版，就是想以我们这微薄的努力，踏上这漫长的旅程，并与诸多同道一起，参与和推动中华文化更新的大业。

最后，我们应向读者交代一下这套译丛的几点设想。

第一，译丛的选书，兼顾学术性、文化性与可读性。即从神学、哲学、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角度出发，考虑有关经典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影响，顾及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选择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

第二，译丛的读者，包括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和各级各类人文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哲学、宗教、人文、社科院系的学者师生，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各级党校相关教员和有关课程学员，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官员和研究人员，以及各宗教的教职人员、一般信众和普通读者。

第三，译丛的内容，涵盖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至今所有的历史时期。包含古代时期（1—6世纪）、中古时期（6—16世纪）和现代时期（16—20世纪）三大部分。三个时期的起讫年代与通常按政治事件划分历史时期的起讫年代略有出入，这是由于思想史自身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所致。例如，政治史的古代时期与中古时期以西罗马帝国灭亡为界，中古时期与现代时期（或近代时期）以17世纪英国革命为界，但是，基督教教父思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仍持续了近百年，而英国革命的清教思想渊源则无疑应追溯到16世纪宗教改革。由此而有了本译丛三大部分的时期划分。这种时期划分，也可以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宗教和思想因素对于世界进程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中译本导言

格伦·汤普森*

公元2世纪早期，基督教会开始迅速发展。由于基督徒举行私人崇拜，避免参加传统的公共宗教节日，就有谣言开始流传，说他们的崇拜仪式里有乱伦、吃人等不道德行径。人们开始不断地向罗马政府指控他们。当时有一位名叫小普林尼的罗马高官受图拉真皇帝（98—117年在位）委派，到罗马行省庇推尼（Bithynia）和本都（Pontus，今天的土耳其西北部）帮助规范行省的财政。当时他在那里处理行政事务，接到需要审判的其他司法案件，其中包括许多被指控为基督徒的案件。普林尼便写信给图拉真，请教如何处理这些基督徒案件。这封信今天尚存。在信中，图拉真同意了普林尼的提议：如果他们不向异教诸神祷告并咒诅基督，就把他们处死。

在这期间，有些基督徒作出回应，以书面申诉皇帝，否定乱伦的不实谣言，解释基督教的基本信念。这些人被称为护教者，他们的作品就称为护教篇（*apologies*，源于希腊文“*apologia*”一词“辩护”）。两百年后，优西比乌（Eusebius）在他著名的《教会史》第四卷里，用很大篇幅讨论了这些作者和作品，认为这是教会发展史的关

* 格伦·汤普森（Glen L. Thompson），美国威斯康星路德学院历史学教授、教父学专家，现任教于香港路德学院。

键时期。他把这场运动的开端追溯到图拉真统治时期一位名叫夸德拉图斯 (Quadratus) 的基督徒, 说“夸德拉图斯写给图拉真的信, 包含对我们信仰的辩护, 因为一些恶人企图给我们[基督徒]找麻烦。很多弟兄, 还有我本人, 都仍然保存着这份文件。它清楚地显示了夸德拉图斯的聪明才智, 也表明了他知道正确的使徒教训。”(4.3.1)

优西比乌还提到其他作者, 如跟随夸德拉图斯领导的埃里乌斯·亚里斯蒂德 (Aelius Aristides), 然后写道, “查士丁, 对真哲学的真正热爱者”(4.8.3)。后来, 优西比乌又称查士丁是“活跃在那些时代的人中最著名的一位, 他以哲学家的方式为圣道辩护, 也在他的作品中为信仰战斗”(4:11.8)。优西比乌在第四卷里花了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介绍查士丁和他的作品, 可见在他看来, 查士丁是多么重要的人物。

查士丁的生平

查士丁是体现罗马帝国时期地中海文化多样性的一个最佳例子。他成长于罗马殖民地弗拉维亚·尼阿波利斯 [Flavia Neapolis, 圣经所言的示剑 (Shechem), 今天的纳布卢斯 (Nablus)] 的撒玛利亚 (Samaria, 巴勒斯坦中部)。当殖民地于 1 世纪 70 年代早期建立时, 他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就移民到那里 (护一 1.1)。他们很可能是原先住在东地中海的另一头, 在殖民地建立之后搬到弗拉维亚的操希腊语者。他们以某种方式, 最有可能是通过在罗马军队里服役, 取得了罗马公民的身份。他的家庭既不是犹太人, 也不是基督徒。关于他的生平, 我们只能从他自己的作品, 优西比乌的一些评论, 以及关于他殉道的一则简短说明——被认为有一定的历史根据——搜集到仅有的信息。

查士丁出生于 100 年至 114 年之间, 从小接受希腊式教育。他先学了阅读和写作, 然后开始研究希腊哲学。他经年旅游, 学习一系列哲学观点, 最先是斯多葛主义, 然后是逍遥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 最后是柏拉图主义 (对话 2.6)。在此期间他肯定接触到许多基督徒, 他

们受逼迫和面临死亡时的勇敢以及自信给他印象深刻（护二 12.1）。最后，约于第二次犹太战争之际（132—135 年），一位“智慧老人”帮助他归信基督教（对话 8.1）。

他的归信并不是外在地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他仍然以哲学家的身份旅行、教学，但如今他宣称耶稣基督的信息高于所有其他哲学。有一段时间他显然在以弗所教学，因为据说他与犹太人特里弗的对话就发生在那里。后来（约 148—161 年），他在罗马居住并教学了一段时间（护一 1.46）。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学派，发表他的护教篇。著名的基督徒学者塔提安（Tatian）是他的学生之一。他也与异教哲学家克雷桑（Crescens）以及其他争论基督教的功德。可能是克雷桑这个激烈反对基督教的人，或者另一个不知名的人，最终使查士丁以及其他六位信徒（其中几位是他的弟子）被捕，为信仰而死。根据《殉道》（*Martyrdom*）记载，此事发生在朱尼乌斯·卢斯提库斯（Junius Rusticus）任罗马总督（162—168 年）期间。

护教者查士丁

当基督教传到罗马世界时，它与希腊—罗马文明的两个对应方面——宗教和哲学发生了冲突。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及文学中保存着对传统十二主神的崇拜，社会的多个层面践行着这种崇拜。这些都是为了确保家庭、城市、帝国的安全和繁荣。构成崇拜核心的祭祀和公共节日得到公众的资助，所有居民都被要求参加。基督徒却拒绝参加，不免有冒犯之嫌。

虽然希腊罗马宗教力图保持神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但它没有为人际交往提供详尽的道德结构，也没有回答人与宇宙的关系或者关于人的必死性这类宏大问题。过去几个世纪的希腊（以及后来的罗马）思想家对这些问题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早期的希腊思想家（今天称为前苏格拉底学派）早已研究过这些问题，即使不是系统的研究；他

们运用理性，对这些问题不断革新，作出新的回答。后来的哲学三巨头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这样的论证推向新的完善水平，希腊化各学派（犬儒学派、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智者学派以及其他许多学派）则进一步发展。基督教出现之后，也宣称要回答这些问题，但基本上基于神圣启示，就是犹太圣经里可以找到的、由拿撒勒人耶稣及其门徒所阐释的神启，这种进路受到大多数哲学学派的嘲笑。

像查士丁这样的护教者力图解释基督教的宗教和哲学进路，以便消除人们对基督教所产生的误解。基督徒诚然不崇拜传统诸神，但他们不是无神论者，相反，他们崇敬独一无二、全能的创造主上帝。在崇拜中，他们为邻人、城市和皇帝祷告，所以他们是良民，不是要助长无宗教倾向，也不是要削弱国家政权。他们的宗教其实有一套比其他宗教更令人信服的道德法则，所以他们也不是要削弱社会的道德结构。虽然他们的一些信念在传统的逻辑范畴里没有意义，但护教者们常常利用哲学方法和哲学术语表明，基督教信仰并不是完全非理性的，它具有有一种内在贯通性和合理性，这是其他哲学学派所缺乏的。果真如此，那么基督徒岂不应当大受欢迎，至少是可以容忍的，而不是受逼迫、被追捕并被处死？他们是在帮助人建立更强大、更道德的帝国，而不是损害它。查士丁和其他护教者力图表明“哲学是真理，理性是属灵权能，而基督教是两者的实现）。 ”^①

然而，教会的敌人并非只有异邦的宗教和哲学。基督教宣称，拿撒勒的耶稣是犹太圣经即旧约里预言的弥赛亚，但大部分犹太宗教领袖都拒斥那样的宣称。随着基督教的发展，也由于犹太人反罗马统治的两次暴动（66—73年和133—135年）失败，教会与犹太会堂之间的敌意日益加深。甚至在基督教会内部，

① L. E. Barnard, *Justin Martyr: The First and Second Apologies*, ACW 56 (NY: Paulist, 1997), p. 3.

也往往难以确定基督徒生活的宗教习俗与犹太人奉行的礼仪之间应当是什么关系。

此外，教会自身里出现了大量教义。基督信仰与其说与希腊宗教相似，不如说与希腊哲学更相似，因为它的特点是一个包含核心信念的信仰体系。新加入的基督徒被要求在那些信念上接受教导，理解它们，然后心甘情愿地认信它们，并按照它们生活——即使那最终意味着死亡。随着教会的发展，关于构成信仰的最准确教义是什么的问题出现了不同的观点。由于永恒救赎依赖于准确信念，所以这些分歧引起热烈的讨论，最后往往以产生持不同教义的独立团体而告结。

2 世纪的护教者也在应对这些挑战。如果需要在基督教与异教和哲学信念的关系上作出解释，并捍卫信仰，那么也需要从它与犹太教的关系角度阐述信仰，回应犹太教师对基督徒提出的误读旧约的指控。随着教会内部的纷争日益剧烈，出现了专门检查并驳斥主流教会及其教义中产生的“其他教义”或异端的专论。

查士丁的一生和他的文字作品都在处理这些问题。他幸存的两篇作品，《第一护教篇》和《第二护教篇》是针对异教和外邦哲学为基督教提供哲学上的辩护，另外一篇保留下来的作品《与特里弗的对话》篇幅稍长，是一位犹太教师与查士丁之间的一场友好争论。在争论中，查士丁捍卫基督教对旧约作出的解释，以及它的观点：耶稣是旧约里众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的成全。我们认为这三篇作品保存在一部独立手稿中。^①

查士丁还写过一些作品讨论基督教会内部的假教义。有一篇比较综合性的，叫《驳一切异端》(*Against All Heresies*) (护一 26.8)，另一篇是《驳马西昂》(*Against Marcion*) (爱任纽 *Adv. her.* 4. 6. 2 也反驳这

①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Gr. 450, written in 1363.

一异端)，马西昂或许是2世纪中叶罗马最著名的基督教异端和分裂主义者。这两篇作品和查士丁的其他一些作品都在几个世纪中佚失了。^①虽然保存下来的归于查士丁之名的引证有几十种之多，但能令人信服地证明是真迹的极少。有些较为完整的作品保存下来也被冠以查士丁之名，但几乎可以肯定不是出于他笔下。^②因此，他作为最伟大的护教者之一的名誉主要基于他的两篇《护教篇》以及《对话》。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篇作品。

《第一护教篇》

从文本本身看，查士丁两篇《护教篇》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统一看法。《第二护教篇》似乎是一份独立的文件，写在《第一护教篇》之后。^③《第一护教篇》写给安东尼·庇护皇帝（138—161年在位）和他的两个养子：马可·奥勒留和卢修斯·韦鲁斯，他们都是未来的皇帝。写作时间只能大概确定是140年至155年，再精确就难了。^④

作为希腊教育的一部分，查士丁应该精通公共演讲的基本原则和范式，所以我们可以预料，本作品必定遵循那些宽泛的范畴和惯例。它将法庭辩论（forensic speech，力求确定过去事件的真相）的目标和

① 早期和中世纪的资料在引用中所提到的查士丁著作有如下题目：《论复活》（*On the Resurrection*），（见下一注）；《驳希腊人》（*Against the Greeks*）；《驳斥》（*Refutation*）；《论上帝的一》（*Concerning the Unity of God*）以及《诗篇》（*Psalter*）。

② 这些作品包括，*Address to the Greeks*，*Hortatory Address to the Greeks*，*On the Sole Government of God*，*Letter to Diognetus*，*Exposition of the True Faith*，*Replies to the Orthodox*，*Christian Questions to Gentiles*，*Gentile Questions to Christians*，*Letter to Zenas and Serenus*，and *Refutation of Certain Doctrines of Aristotle*。

③ Minns 和 Parvis 最近指出，《第二护教篇》的最后两章其实是《第一护教篇》的结尾，《第二护教篇》的其他章节都是查士丁作品的残篇，随意拼凑在一起，并没有什么顺序（*Justin, Philosopher and Martyr*, pp. 21–31）。

④ 文中提到哈德良的特殊“朋友”Antinous 的死（130年），也提到犹太 Bar Kochba 暴动（132—136年）是最近的事，这表明作品写于2世纪40年代早期。但是从它的行文看，当时马西昂异端似乎已经广为传播，而那是50年代才发生的事。它还说基督出生于150年前（约46年），所以150年上下这个时间应该不会相差太远。

形式与协商演讲（*deliberative oration*，针对某个话题力求说服听者）结合起来。它按传统分法分成六十八章，开头是传统的引言（1），接着简短地概述对基督徒提出的指控，呼吁更加公正的听证（2—3），驳斥对这种新信仰提出的指控（4—13），然后提出主要论证，表明基督教就其自身来说不应被看作恶教而拒斥（14—67），结尾的概述估计是为了激发听众赞同这样的论证（68）。然而，在不偏离这个一般性大纲的前提下，查士丁不时地离题，随意插入另外的话题，让人感觉整部作品具有个人特点，有点随性而作。

他一开头就说，理性命令人应当跟随真理，拒斥并惩处邪恶，对基督徒也应当这样，对他们进行正式调查，只有确证他们犯了罪才定罪（2—3）。但是现在，基督徒只因他们所拥有的这个称号被判刑，即便他们像苏格拉底那样，是基于理性否认传统诸神（4—5）。对他们的主要指控都是假的：他们虽然不信诸神，但他们不是无神论者，而是一神论者，敬拜万物之创造主。他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是因为他们诚实，过着善良生活，死亡不能吓倒他们；他们是好公民，不惧怕被上帝亲自审判（6—13）。

查士丁警告读者不要被鬼魔误导。他指出，社会各阶层和各民族中有许多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彼此和睦地过着新的生活，努力遵循基督制定的更为严厉的道德法则（14—16），其中包括缴税的义务（17）。基督徒相信死人复活，但他们的教义绝不比占卜者的更坏，与某些希腊哲学学派教导的也并无很大不同（18—22）。真正非理性的是异教教义，而基督教的许多教义可与希腊神话传说相类比（21—22）。但基督徒相信这些事是基于极其古老的旧约启示，它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成了人，做人类的教师（23）。然而，唯有基督徒受到惩罚，其他伪宗教分子行真正可羞耻的事，却逍遥法外；基督徒不弃婴，也不行放荡淫乱之事（24—29）。

基督远不只是一位行神迹者，他是弥赛亚预言的成全者。摩西、

以赛亚、弥迦、西番雅和其他先知就将有一位弥赛亚要到来作了大量预言——这位弥赛亚也要被他自己的民拒斥（30—38）。这一信息由他的十二门徒向全世界传播，当归信者被指控为基督徒时，他们高兴地面对死亡，而不是说虚谎的话（39）。旧约的预言确信基督的永恒统治，所以当它们描述这样的预言时用的是过去时态（40—42）。每个人都可选择行善或作恶，每个人必因此各受报应。柏拉图和其他人通过阅读旧约和摩西作品得知其中一些真理（43—45）。

尽管基督活在世上只是150年前的事，但基督教不是一种新的宗教，因为基督是上帝的头生子，他的事工救赎或定罪所有活在他前面的人（46—47）。很早以前就有预言说，耶路撒冷要被毁，基督要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他要受苦并受死作为赎价，外邦人要接受他，犹太人要拒斥他（48—51）。既然那么多诸如此类的预言都已经成真，基督徒相信，基督要在荣耀里二次来临审判世界的预言也必将成真（52—53）。其他人看起来似乎也行同样的神迹，但那是借着鬼魔的力量拙劣的仿效，不是真正的大能（54—58）。柏拉图和其他人所获得的真理是从摩西继承来的（59—60）。

基督教的洗礼不同于异教庙宇里所奉行的洒水礼，它要先有教导，还包括承认过去的罪和重生（61—62）。这是借着基督的名，以及在旧约时代已经存在的圣灵的名而行的。新加入的基督徒可以一起祷告，也可以参加圣餐（感谢祭）（63—66）。主日聚会用来教导这些真理，诵读“使徒福音书和先知书”，祷告，集资捐助有需要的人。所以，理性必会促使皇帝学习他父亲哈德良的做法。最后，查士丁附上哈德良的一封信，信里吩咐，只有提供了作恶的证据，才能惩罚基督徒（68）。^①

① 学者们通常认为哈德良的这封信是真实的。在保存下来的手稿中，另有一封模仿它的信，据称是安东尼·庇护发出的（CPG 1074）。这表明查士丁的《护教篇》说服了皇帝，使他改变了政策。这第二封信也保存在优西比乌的《教会史》里（4.13），但似乎是2世纪晚期或3世纪仿造的作品。

《第二护教篇》

所有证据似乎都表明查士丁的《第一护教篇》从来没有被皇帝看到过，或者至少没有对帝国政策产生任何影响。在它写完一段时间后，罗马发生的一件事促使查士丁再次拿起笔，那就是三位基督徒被罗马城的总督乌尔比库斯（144—160年）批捕，并被立即处决（护二1）。事件的起因是一个异教徒正式指控力图与他离婚的妻子是基督徒。教导她基督教的人和另一名基督徒也被一同处决，不是因为任何恶行，仅仅因为他们是基督徒（2）。查士丁觉得他本人和基督团契里的其他人有遭受同样命运的危险，这种恨意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名叫革勒士的犬儒学派哲学家激起的。他在城里的名声就是靠煽动市民反对基督徒得来的，但他“完全没有读过基督教的教义”（3）。^①

查士丁接着再次概述为何基督徒应当与其他人一样，按照他们的行为审判，而不能只是因为有“基督徒”这个名称就被定罪。上帝交给他们在地上传播好消息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他们永远不会自杀，但他们愿意被处死，宁死也不愿否认基督的原因（4）。堕落天使和魔鬼造出这个世界上的恶，但基督比他们更强大，能够克服他们的恶（5—6）。上帝必带来审判，但现在他延迟审判，是为了基督徒和他们正在为他做的工（7）。

正如以前的一些哲学家仅仅因为遵循逻各斯^②赐给他们的教训而受到惩罚，同样，如今，基督徒得到完整的逻各斯信息，他们不应因遵循教义而受到惩罚（8）。虽然人们对何谓善恶可能观点不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善恶（9）。由于基督徒得赐耶稣的完全教义，完全逻各斯，

① 在这份保存手稿的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有关于革勒士的内容。而优西比乌曾引用过这内容，并说它属于第二章之后的内容（《教会史》4.16—17）。大多数版本和译者都接受优西比乌的这一说法，认为这种可能性更大。

② *Logos* 为希腊语，意思是“教训，话语”。在希腊哲学里它有非常多的含义，基本上都与某种能够把真理传递给人类的神圣理智有关。《约翰福音》用 *Logos* 来描述耶稣本人以及他的教训。